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

# 北洋海军研究

(第二辑)

戚俊杰 刘玉明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学术顾问：**

戚其章 王家俭（台湾） 中塚明（日本） 关捷 王如绘  
**主 编：**

戚俊杰 刘玉明

**副 主 编：**

刘新乔 王记华

**编 委：**（按姓氏笔画序）

于书明 王天江 王记华 丛华滋 丛中笑 史丰永 孙园园  
孙寿健 刘玉明 刘新乔 刘新芳 邱战国 毕可江 宋德永  
郭 阳 戚俊杰

**特约编委：**

刘申宁 许 华 苏小东 苏爱荣 姜 鸣

## 目 录

### 北洋海军与甲午之战

#### 甲午开战与“陆奥外交”

——以日本“六二出兵”为中心 ..... 戚其章 (3)

#### 偶然乎？必然乎？

——综论日本发动侵华甲午之战的必然性 ... 刘玉明 马洪喜 (19)

清流派与甲午战争 ..... 张登德 (32)

希理哈《防海新论》与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 ..... 王宏斌 (43)

#### 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

——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 ..... 马幼垣 (54)

北洋海军建军时期的山东沿海状况 ..... 徐明轩 (72)

甲午战争史研究综述 ..... 许 华 (81)

### 近代海防教育

近代海防意识与海防教育 ..... 于敬民 于建丽 (101)

洋务运动时期海防教育思想略论 ..... 张彩霞 黄顺力 (116)

清末海军教育的缘起、演变及作用 ..... 于耀洲 邢丽雅 (127)

晚清海军教育格局述论 ..... 董丛林 (145)

## 破樊篱之举 开风气之先

### ——从近代教育改革和发展角度看晚清海军教育的特点

- ..... 丛领滋 (155)
- 晚清海防教育与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 黄顺力 (164)
- 试论北洋海军的教育与训练 ..... 戚海莹 (176)
- 清末海军教育与中国海军近代化 ..... 刘淑梅 (190)
- 福州船政学堂与北洋海军 ..... 于春梅 刘恩格 (202)
- 福州船政学堂与中国近代海防教育 ..... 孙占元 (215)
- 由甲午战败到现代海防教育

### ——兼论近代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水师学堂

- ..... 丁昌明 丁楚凡 (224)
- 李鸿章与刘公岛水师学堂 ..... 张广余 (233)
- 从广东实学馆到黄埔水师学堂

### ——晚清广东的海防教育 ..... 赵春晨 (239)

- 江南水师学堂述评 ..... 崔恒秀 王建华 (253)
- 北洋海军的鱼雷专业培训及其成效 ..... 苏小东 (261)
- 十九世纪后期中日海军教育比较 ..... 史滇生 (283)

## 人 物 述 评

- 陈兆镛的光辉人生 ..... 戚俊杰 (295)
- 李鸿章与奕訢等总理衙门大臣对日本认识的比较 ... 王如绘 (311)
- 李鸿章与晚清海防教育 ..... 商鸣臣 商秀梅 (335)
- 李鸿章的对日观与晚清海防战略 ..... 刘中宁 (349)
- 从北洋海军的创建看李鸿章 ..... 刘玉明 马洪喜 (384)

|                         |               |
|-------------------------|---------------|
| 张之洞的海防思想与海防教育 .....     | 黎仁凯 (398)     |
| 李秉衡与甲午战争 .....          | 商鸣臣 商秀梅 (409) |
| 简论甲午战争时期的张文宣 .....      | 张广余 (419)     |
| 刘公岛水师学堂的优秀学生——吴佩之 ..... | 张小琴 (424)     |
| 马吉芬与北洋海军 .....          | 马幼垣 (435)     |

### 反思与启示

#### 开展海防教育，加强海防建设

|                    |               |
|--------------------|---------------|
| ——由甲午战争引发的思考 ..... | 张序三 (461)     |
| 甲午战败的再反思 .....     | 郭墨兰 杨本春 (466) |
| 由“备战”论甲午之役海战 ..... | 罗海贤 (477)     |
| 雪甲午耻 .....         | 刘达材 (493)     |

### 史料辨伪

|               |           |
|---------------|-----------|
| 历史应由谁来写 ..... | 刘申宁 (503) |
|---------------|-----------|

# 北洋海军与甲午之战





## 甲午开战与“陆奥外交”

——以日本“六二出兵”为中心

戚其章

陆奥宗光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以外交手段“狡狴”而闻名，对促成甲午开战负有重大责任。但在日本国内，历来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如今，在日本外务省院里，历届外务大臣中只树立了陆奥的铜像，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在日本史学界，陆奥还被打扮成一位推行和平外交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宣传。这种观点能否成立，是值得重新加以研究的。

—

日本的“六二出兵”最可以表明“陆奥外交”的性质，故研究“陆奥外交”者多重视对“六二出兵”的研究。所谓“六二出兵”，就是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召集内阁会议，决定向朝鲜派遣军队。陆奥宗光本人记述此事道：

适接杉村（浚）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

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枳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sup>①</sup>

在陆奥的笔下，把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六二出兵”写得如此轻松，这就容易示人以假相，似乎“六二出兵”并不意味着要同中国交战，而只是想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势力均衡而已。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维护势力均衡”政策。

正由于此，有不少论者断定，“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日本已故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即持此观点。他认为，陆奥宗光的出发点是和平地解决朝鲜问题，出兵是出于无奈和被动的。“陆奥外相必须为和平收拾时局而努力。但是，在清国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已经不能厚着脸皮后退了。”即使出兵，他仍然主张“维护势力均衡”政策。至于后来走向战争，“这就不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sup>②</sup>。

此说在日本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而且直到现在在日本历史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sup>③</sup>。如京都大学的高桥秀直写了一部题曰《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的书，进一步发挥了信夫清三郎的观点，认为：“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并非即使与清相争也要独霸朝鲜，对清朝一贯是避免战争的。……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对抗清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但这是出于对清朝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而并非是积极地图谋与清对战。它是准备对付万一发生的事态的，只要日清间的悬案未解决，就有可能发生不测。”所以，“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sup>④</sup>。熊本大学的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的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案的提出也不是要对清朝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并指出：“从全

局看，对清开战是起初的政策目标失败的结果，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并克服种种障碍最终实现开战的过程”<sup>⑤</sup>。1995年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专门组织了一次“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的展览，在所陈列史料的选择与布置上也着意地突显了“陆奥外交”的和平色彩<sup>⑥</sup>。由此可见，此说在日本之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远了。

但是，种种事实表明，日本的“六二出兵”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偶然的。且不说日本早就想伺机挑起战端，即从甲午战争前夕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来看，即足以说明日本已在精心策划这场战争了。

首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日本报纸争相传布，大造舆论，甚至鼓吹“宣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sup>⑦</sup>。陆奥宗光与之心有灵犀，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sup>⑧</sup>。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寄希望于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于是，他密令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密切注意东学党的动向，并仔细观察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sup>⑨</sup>。到5月29日，陆奥早已急不可待，再次密令杉村探听朝鲜政府是否已向中国求援。6月1日，杉村探知朝鲜国王李熙决定向中国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急派书记生郑永邦访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一面问“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勘”，露出急盼中国出兵的心情，一面又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用此虚伪的口头保证来麻痹袁世凯。翌日，杉村又亲访袁世凯，进一步表示“盼华速代勘”的迫切愿望，以诱袁世凯上钩。袁世凯果然上当受骗，电禀李鸿章称“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sup>⑩</sup>就在当天，日本内阁就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其实，到6月3日，朝鲜政府才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再到6日，清政府才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所部910人乘海轮赴朝，并与当天根据1885

年中日《天津条约》第三款知照了日本政府。而在事实上，日本内阁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是在朝鲜政府正式请求中国派兵的前一天，也是中国正式派兵赴朝的前四天，所以说日本是被迫出兵纯属无稽之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日本派兵的实际情况看，也可证实是早有预谋的。早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时，日本参谋本部即着手进行出兵的准备。川上操六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斧山搜集情报。稍后，又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斧山，继续进行调查。5月30日，伊知地返日本汇报情况。川上遂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政府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护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sup>①</sup>同时秘密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显而易见，此与陆奥宗光的意思不谋而合。当天，陆奥就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议。31日，他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若不早做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sup>②</sup>可见，就陆奥本人而言，早在内阁会议的前两天就决意出兵了。“六二出兵”是出于被动还是先期预谋，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复次，从日本出兵的规模和部署看，也不能说是为了维持中日在朝鲜的势力均衡。日本内阁作出“六二出兵”决定的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共同讨论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势必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估计中国所派军队不会超过5000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派6000至7000的兵力。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迄于7月24日，即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前一天，清政府总共才派了3880名士兵到朝鲜牙山。为准备中国进一步增加兵力，日本应作派出一个师团的打算，而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日本决心要在兵力上压倒中

国，其用心可想而知。后来，林董回忆当晚三人的讨论情况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sup>⑬</sup>。看来，陆奥与军部的意见完全一致，在此问题上并无分歧可言。这也说明了“维护势力均衡”说之虚妄。

第四，6月5日，即中国正式派兵的前一天，日本即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大本营。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当时，如果日本只限于派出一个混成旅团，顶多派出一个师团的话，那么，从军事指挥上说，有什么必要设立如此庞大机构的大本营？这更是“维护势力均衡”说所无法自圆其说的。对此，只能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6月2日晚上陆奥宗光与川上操六已经达成共识，外务首脑与军事实权人物沆瀣一气，决心趁此机会将朝鲜问题引向对中国开战。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上述可知，关于日本“六二出兵”的目的诸说，如“出于被迫”、“和平目的”、“维护势力均衡”等等，都是基于主观臆测而提出的，是难以令人凭信的。若真像以上所说那样的话，那东学党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后为什么不肯撤兵？其后，清政府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政府又为什么仍令军队赖在朝鲜不走呢？这都是上述诸说所无法回答的。

## 二

对于上述诸说，也可以将其归结为“非战目的”说。因为这些说法尽管用语不同，提出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为日本的“六二出兵”不是出于战争的目的。其根据有四：

第一，是日本假想敌的改变。信夫清三郎认为：“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是中国。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假想敌国已是竞相分割以前的假想敌国的西欧各国了。”<sup>⑭</sup>他引用了山县有朋的两段话：一是1882年山县关于扩充陆军的建议，内称：“现在，欧洲

各国距我国遥远，痛痒之感并不紧迫。……而观察我国近邻形势，迅速勃兴，绝不可忽视。……我国欲与之角力者，并非痛痒之感不甚紧迫之国，而在日本之近邻。”这里的“近邻”乃指朝鲜和中国，自无问题。一是1893年山县关于扩充海军的建议，内称：“我们不能不想到，东洋祸机不出十年即将破裂。那时，我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sup>⑤</sup>对第二段话应该如何理解，颇值得研究。从这段话中，并不能得出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成为日本的假想敌的结论。因为山县所讲的“东洋祸机破裂”不是指眼下，而是“不出十年”，应该是20世纪初的事了。所以，据此认为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不把中国视作假想敌了，理由是不充分的。其实，1890年山县抛出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即明确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与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sup>⑥</sup>这里的所谓“利益线”，指的仍然是朝鲜和中国。可是，对日本来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其主要假想敌始终是中国，并不存在假想敌改变的问题。

第二，是日本军备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信夫清三郎专门引用了海军大臣樺山资纪于1891年12月在会议上说的一句话：“今日军备之不能独立，使本大臣痛苦不堪。”<sup>⑦</sup>此外，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类似的看法。如称：“在日本有没有钢铁原料呢？除了正在使用的以外，当前还没有陆海军能够使用的原料。……当前仍然须从国外购买。本来此事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兵器的独立性，并非主要为了发展经济。然而，为确保兵器的独立性而从国外购买原料，是不可能实现兵器的独立性的。”再如称：“一旦有事，不幸与钢铁供应国开战，或者钢铁供应国保持局外中立，或者交通被敌舰切断，则现有的军舰、兵器就会立即出现不足，或者为了维修军舰、兵器，在材料方面发生困难。若如此，怎样才能圆满地保卫国家社稷呢？实在不能不令人寒心。”<sup>⑧</sup>以上所言，诚为事

实，但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日本会放弃其扩充野心而不去发动侵略战争。应该看到，明治维新以来，迄于甲午战争，日本每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都含有很大的军事冒险主义成分。试看 1874 年日本发兵入侵台湾时，他的军备能够独立吗？显然不能够。尤其是当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时，不仅在军备方面说不上完全独立，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指出：“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事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sup>⑩</sup>战争才打了二三个月，一些西方人士就认为“日本已经筋疲力尽了”<sup>⑪</sup>。他们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1895 年 1 月 4 日，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P. de Poer Trench）曾就日本的财政形势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g）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尽管日本人强作乐观，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 12 月 29 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 280 万元的有息纸币，12 月 31 日又发行了 120 万元。有些人认为，这种特殊的纸币的发行将会加速货币流通，从而具有提高股票价格的作用，但是商业界对此表示怀疑。日本银行有在非常情况下发行这种钞票的特权，现在之所以运用这一特权，肯定是迫于存在强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在今后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 3000 万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sup>⑫</sup>

这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史料，它证实了许多中外人士的预计，如果中国能将战争久持下去，日本必定支撑不下去，胜利就会转到中国方面。上述情况一再说明，无论是日本在 1874 年发兵侵台，还

是1894年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都是在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靠军事冒险取得成功的。所以，用军备不足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的和平目的，是很难成立的。

第三，日本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个理由是相当片面的。当时日本许多媒体鼓吹战争，甚至叫嚷要灭亡朝鲜，“冲其巢窟降其王”，“蹂躏八道意气扬”，并进而侵占中国，“何不蹂躏四百州”<sup>②</sup>。这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不过，信夫清三郎把这些战争叫嚣都视为非主流观点，他特地引证了能够“反映日本政府外交政策”和“具有权威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的两篇关于出兵政策的社论”：第一篇是6月9日的社论：

政府最后决定向朝鲜派兵。若干支戎马不日将向汉江进发。而且，清国军队也已经进入朝鲜。我们希望我国的自我克制之师，不久将满载荣誉与和平凯旋。这次派兵，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在朝鲜的侨民。日本对朝鲜绝无任何企求。因此，事平之后，按照《天津条约》，与清兵一起撤退，不复留防，此乃理所当然。其结果，我们只想使朝鲜恢复到发生叛乱前的状态。我们岂能以一种局势的变化而危及朝鲜的独立呢？我们只是依据历来的政策主张，努力保护朝鲜。……既然我国的派兵目的如此，我国的对韩政策如此，派遣将士，无论陆军和海军，都须以和平为目的进退运动。

第二篇是6月12日的社论：

向韩国派兵的目的，正如我国陆海军当局允许公开披露于报纸所言，主要在于保卫公使馆，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侨民。从明治15年（1882年）《济物浦条约》来说，这也是不容置疑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实现和平护卫和保护的实际效果。……待其恢复和平以后，则要光荣地撤退。<sup>③</sup>

《东京日日新闻》作为日本政府的喉舌，反复发表社论大讲出兵的目的，只是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不可以信以为真。何况对这两篇

社论也要作全面的理解，就是它们在宣传日本出兵的和平目的的同时，也偶尔透露出其潜藏的杀机。例如，6月9日社论称：“关于朝鲜问题，日本应向天下表明处以仁义之地，努力使我国经常处于主动地位。……为此，无论以哪一国为敌，以我日本帝国一贯的侠义政策，断不可逃避之。”6月12日社论则称：“当然不可为和平而损害荣誉。万一发生不测事件，我节制之师亦不得不为帝国荣誉而勃然大怒，不可不决然而断，猛然而行，以雷霆之势击之。”<sup>②</sup>这两段看似附带的话，在社论中很不起眼，而且文字也比较婉转含蓄，其实正点出了日本出兵的真实目的：借此机会挑起战争。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故靠引证日本政府喉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社论，取其一部分内容而加以片面理解，以此说明日本出兵的和平目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四，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日本的“六二出兵”只能限定于和平的目的。信夫清三郎引用了刊载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段话：

对于垂涎满洲和印度的俄国，中国的利害关系正好同英国一致。而且，为不使法国向印度支那扩张其版图，中国注意的问题也与英国相同。另外，关于中国同缅甸的边境，或者在新加坡、婆罗洲和香港，不仅需要使中国人服从英国的规定，以维护和平，而且，只要同中国建立了和睦关系，关于移民的事件，中国才能给英国移民部以方便，这些地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强大的殖民地一样，就不会出现危险的斗争了。<sup>③</sup>

这段话说明中英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害关系。随后，信夫又分析了美国的远东政策。从而得出结论说：“没有一个国家允许日本采取积极行动。”另外，《天津条约》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限制。因为日本出兵朝鲜，若“超出维持均衡的范围”，世界列强就会起来反对，“而反对的法律依据就是《天津条约》”。因此，信夫认为，惟其如此，“日本的政策最终仍不得不停留在‘维护权力均衡’

上”<sup>⑧</sup>。这种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问题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是绝对不行的。信夫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采取静态的观察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看到，国际关系风云变幻莫测，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日本“六二出兵”的前后，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正使远东国际形势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例如，俄国政府在甲午战前的对日政策一直在干涉与不干涉之间徘徊，直到战争后才决定采取干涉政策；英国在朝鲜初起时和战争初期始终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但不同意干涉。所以，日本政府既决意挑起衅端，是完全有隙可乘，以遂其志的。此其一。再就是日本需要一段时间摸清英国政府对中日政策的底线。对此，日本外务次臣林董回忆说：“在日清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关于宣战问题，总理大臣仍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着相互援助的密约而犹豫，海军大臣担心北洋舰队的形势而犹豫。然而，到7月末，英国看到日清间的和平不能维持，于是发出照会，要求上海及其通道附近不要成为战区，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朝鲜事件的发展终于到了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的程度，于是宣战。”<sup>⑨</sup>什么叫“除开战外别无他途”？真是如此吗？无非是已经弄清了英国对中日政策的底线，始拖到7月下旬才开始以兵戎相见了。此其二。由此可见，对于日本的战争政策来说，西方国家可能会起到限制的作用，但也可能起到支持的作用，一切皆以西方国家本身的利益为转移。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用来证明日本“六二出兵”不具有战争目的几条理由，无一能够站得住脚的。明治维新时期曾担任海军大辅的胜海舟，即曾论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为“无名之师”<sup>⑩</sup>。可以断言，无论给“六二出兵”堆砌上多少巧言饰词，都掩盖不住日本大兴“无名之师”的本来面目。